

新常态的共识和分歧

汤铎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引言

近来论及我国经济，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恐怕是“新常态”。自习近平主席去年5月和7月两次提及后，各种解读便纷至沓来。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用九个要点来总结新常态。平心而论，最恰当的解读恐怕是更早时候提出的三期叠加论断，即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实际上，三期叠加又是改革、发展同稳定关系的具体体现。增速换挡对应发展的速度，结构调整对应改革的力度，刺激政策消化对应稳定的程度。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逻辑，万变不离其宗，而政府的政策表述也自有其一贯性和承继性。

新常态和三期叠加论断已经在决策层和理论界取得共识。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也没必要持续，减速换挡已成必然。其次，减速只是表象，实质在换挡，即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牵扯到各种结构调整和结构变化。需求、产业、区域、城乡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结构，都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优化提升。最后，国际经济危机后，强刺激措施虽然使我国经济较快走出了危机，但是也加重了传统增长方式下的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等痼疾。在当前的特殊时期，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转换思路，保持定力。

然而，新常态上的共识主要是战略层面的，具体到战术层面，则存在较大分歧。对应于三期叠加或者改革、发展、稳定，这些分歧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总结。具体而言，三大分歧可以概括为：增速换挡上的低速派和高速派，结构调整上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本格派和创新派。

分歧一：增速换挡已成共识，但具体挡位存在分歧。

10%的高增长不可持续，那么，下一阶段合适的增速到底是多少？从2012年1季度到2014年3季度，我国经济连续11个季度在7%~8%的区间运行。以7%为界，对我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可以分成两派。预测7%以下为一派，不妨称作低

速派，比如 2015 年 6.8%，2016 年 6.5%；预测 7%以上为一派，不妨称作高速派，比如 2015 年 7.2%，2016 年 7.4%。虽然 6.8%和 7.2%表面只差 0.4 个百分点，但是其背后的依据和政策涵义却可能截然不同。

传统宏观经济研究常常会把变量分解为两部分：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周期波动。前者也被称作潜在增长率，由资本、劳动和技术等长期因素决定，变化缓慢而平滑；后者反映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之差，又称作产出缺口，通常由总需求变动等暂时性因素造成。正的产出缺口对应通货膨胀，负的产出缺口对应失业。产出缺口不会无限扩大，经济有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的倾向。

在上述理论逻辑下，低速派通常认为我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的潜在增速应该在 7%以下甚至更低。随着潜在增速缓慢下滑，实际增速会有跟随向下的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正的产出缺口的概率更大。相反，高速派则认为我国未来的潜在增速在 7%以上甚至更高。因此，目前经济大体运行在潜在水平，或者存在负的产出缺口。显然，如果对增速换挡的具体挡位判断不一，那么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就会给出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

分歧二：结构改革已成共识，但实施力度存在分歧。

在新世纪以来的扩张周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这一模式加快了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然而，其副作用也绝不可忽视。除了环境污染、债务负担和产能过剩，这一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阻碍甚至扼杀了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形成。利用政府隐性担保和行政权力，产能过剩和效率低下的项目占用了大量经济资源，极大限制了市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比如，所谓融资难，其实质是民营资本、创新资本无力与政府隐性担保和行政权力相抗衡；所谓融资贵，其实质是政府主导的粗放高增长模式拉高了无风险利率和风险贴水。

无论在高层还是坊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诉求甚至行动都由来已久，无奈一直举步维艰、效果不彰。2008 年经济危机后的强烈扩张政策，使得此前的一些努力再次付诸东流。然而，随着外需和房地产基建投资放缓，拥堵雾霾、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增长动力转换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于是，不刺激、去杠杆和推进结构改革的“克强经济学”横空出世。克强经济学

问世后遭受了一些质疑，抛开传统增长方式下的既得利益者和无谓的名相之争，其核心在于质疑者对动力转换能否成功心存疑虑。

举个例子。假设我国经济是一架行驶中的飞机，有两个引擎。旧引擎的动力和效率都在下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用效率更高的新引擎代替。那么，质疑者的逻辑是，如果关停旧引擎，发现新引擎不工作，怎么办？所以，改革大计不可急功冒进，宜徐徐图之。支持者的逻辑则是，不关停旧引擎，燃料都被浪费光了，新引擎如何工作？所以，动力转换刻不容缓。一般来说，在飞行相对平稳而燃料快速消耗时，支持者占上风；在突然减速和剧烈颠簸时，质疑者占上风。显然，二者在最终目标上并无二致，只是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意见不一。准确地说，质疑者是动力转换中的保守派，支持者是动力转换中的激进派。

需要强调的是，激进派固然言之凿凿，保守派也并非危言耸听。对一个长期高增长的经济体而言，资本收益和债务利率一般较高。在经济明显减速而无风险利率和风险贴水却没有相应下降的时候，两类风险极易爆发。第一是收入分配。总收入下降而资本收入不变，劳动收入势必受到侵害，如果再夹杂上失业问题，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第二是债务。收入减少但是利息负担没有变化，这就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债务违约，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分歧三：不搞强刺激已成共识，但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存在分歧。

我国去年的货币政策操作颇耐人寻味。先是在4月份和6月份两次定向降准，然后在下半年多次利用PSL（抵押补充贷款）和SLF（常备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创新工具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最后在11月21日出人意料地宣布降息。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两大中央媒体——新华网和人民网——去年9月份的一次交锋。8月份经济数据发布后，新华网批评了“期望政府采取降息等强刺激政策的悲观论调”，认为这是“对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改革的不信任”。人民网次日即指出，“市场期待降息和是否信任改革没有必然关系”，“是否降息、降准都应该取决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两大央媒在不搞强刺激上并无异议，争论的实质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上。人民网的题目是“降息不是改革的对立面”，其深层次的涵义是不能用改革绑架宏观经济政策。央行降息后，一些投行经济学家更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论点。

根据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而不是用来促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调节总量而非结构，关注短期波动而非长期增长。故此，人民网和投行经济学家的论点以经典理论为依据，中规中矩，可以称作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理论派或本格派。

新华网显然不赞同本格派的观点。在旗帜鲜明地指出“寄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烫平’周期的论点和做法是一种短视”之后，新华网在所谓“定向调控”上着墨颇多并寄予厚望。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从来都不是本格派。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但工具繁多，而且目标混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常常被赋予多重目标，需要承担多重责任。去年上半年的两次定向降准就是例子，货币政策承担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任务。

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我国的做法一直是理论界挞伐的对象。然而，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目标过于单一，可能是本次危机的诱因之一。紧盯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政府需要积极运用包括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在内的多种政策手段，而政策目标也应该关注包括产出结构、资产价格和杠杆率在内的多个方面。西方国家的反思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辩护。从这个角度看，新华网的观点和我国的政策实践姑且可以称为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现实派或创新派。

结论

首先，当前局面下，我国围绕新常态达成的共识难能可贵。在三期叠加之前，我国经济实际上还遭遇了一个“内外叠加”，即我国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和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相叠加，最终造成了我国经济的剧烈振荡。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这种剧烈震荡反而使我们愈加清晰地看到了我国的经济困局和解决之道，而且在很大范围内达成了共识。这种战略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力量和信心之源。

其次，新常态上的三大分歧表明，我国经济目前处于复杂而关键的转折期，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谨慎应对。无论是增速换挡中的低速派和高速派，还是结构调整中的激进派和保守派，抑或是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本格派和创新

派，都没有简单的高下对错之分。经济学是关于选择和权衡的科学，最优解往往是二者折衷而非某个极端。分歧的存在一方面可能会造成纷乱，另一方面又恰恰是促成最优折衷的力量。

最后，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的宏观经济学知识是多么有限。在讨论宏观经济时，人们经常会使用很多隐喻。比如，政策药方的说法是把宏观经济比作有机体，踩刹车的说法是把宏观经济比作汽车或机械。前文也用行驶中的飞机来比喻我国经济。比喻是为了简化，让听众更加容易理解。宏观经济要比有机体和机械复杂得多，而我们的宏观经济知识也要比另外两个领域的知识少得多。所以，宏观经济决策的实施是在有关知识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牢记这一点。